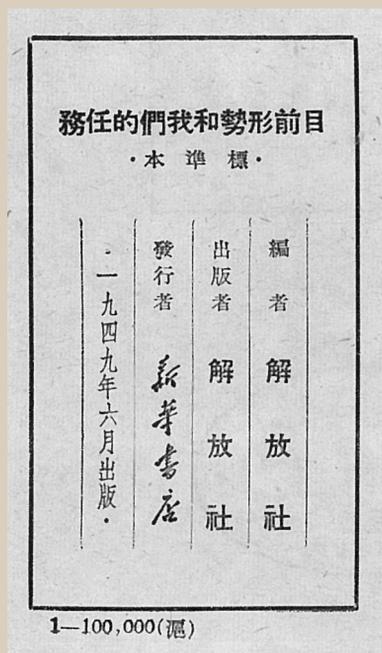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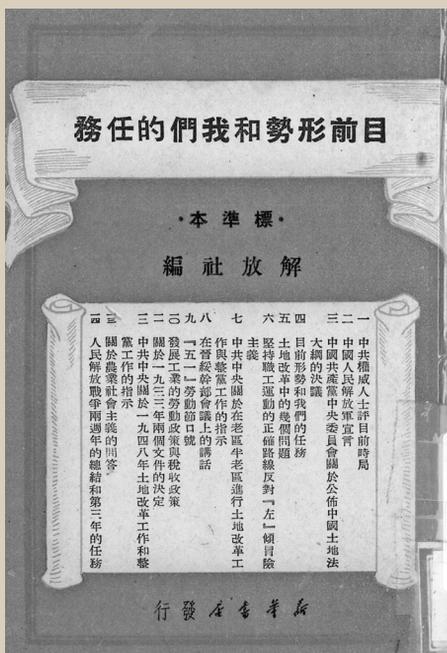

一、面對轉折——1984年1、2月

毛澤東《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衝擊波——《人民日報》傳出的信息——蔣介石的元旦訓詞——《文藝先鋒》宣布的官方文化政策——《大公報》和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信仰



解放社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封面及內頁，1949年6月出版，收錄了1947年5月至1948年7月關於中國共產黨政策的14個重要文件

葉聖陶 1948年1、2月日記（摘抄）

1月8日（星期四） 續選教材，寫信。午後五時，開業務會議。報告而外，多為閒談。通貨膨脹益甚，物價跳漲益速，貨物售出得貨幣，將無從取回原貨，因而營業不如不營業之為愈。然開明之機構已不為小，如何維持支撐，實非易事。來日大難，局面不變不成，而變亦將趨紛亂。就一般人生活而言，今後難堪殆將十倍於抗戰時期矣。會畢聚餐，八時歸。

10日（星期六） 上午忽傳斯大林逝世，係英美電訊社誤傳，至晚報出版，始知為謠言。前數日曾傳蘇聯有一要人患癌病，請瑞士某專家往診。今忽聞此謠，足見英美人仇蘇之深。

16日（星期五） 夜七時，讀書會集會，諸人閱讀高爾基之《母親》，討論歷兩小時。（按：這是在中共影響下的進步期刊的編輯人的秘密聚會，除讀書外，還交換有關信息。）

23日（星期五） 放工後，與伯祥趨車至振鐸家，觀其新得之俑。一般之俑多正立，不為動作之形相，此次所得九俑，皆作舞蹈之狀，其一則倚石側立，衣服為粉彩，上加金飾，故為可貴。既而共飲，陳冷盤三十二具，各色不同，皆其家製。酒次談及二十餘年來之往事，歡笑滿座。振鐸藏有較舊之墨，余向索三錠，他人亦各取數錠。辭出後，於車中間談，予同謂振鐸之忽趨考古，亦精力無可寄託之所致。九時半到家。

27日（星期二） ……酒罷，至對面虹光影院，看名片《鴛夢重温》。此片以戰士經受傷，患遺忘病為題材，尚可觀。

28日(星期三) 午後，有一寧海少年丁君來訪，請介紹工作。問其學歷，僅畢小學業。家有田三四畝，由父耕種。兄在寧波讀書。以家況貧困，故來滬找工作。而上海曾無一親半友。問其何以敢冒然出此，則謂高爾基不亦到處流浪，亦工亦讀，以臻成學耶。余告以無能為力，則淚下不止。執其手而別，余心頗為歉然。

31日(星期六) 晨間閱報紙，知甘地被人狙擊身死。……目前世界已裂為兩線，一為人民勢力，一為反動勢力，雙方之鬥爭實不可免，而甘地導之以和平不爭，或為見惡於人之一因。

2月5日(星期四) 夜於收音機聽衛仲樂彈琴，其《流水操》極富描寫之能事。

6日(星期六) 趙梅深自開封來，云將往北平。據談豫省戰況，全省僅三數縣未遭波及。民眾深知雙方作風不同，多以為彼勝於此。而此方軍政界之蠻橫，竟使人幾無生路。為之歎息。

9日(星期一) 得平伯寄示慰佩弦(按：即朱自清)一律，粘之。承告佩弦《不寐書懷》之前四句：「中年便易傷哀樂，老境何當計短長。衰病常防兒輩覺，童真豈識我生忙。」其意想甚蕭颯，為之不怡。

18日(星期三) 下午開經理室會議。瀋陽分店副經理李統漢來書，言瀋陽已成圍城，人心惶惶，渠擬設法撤退。……抗戰期間，我店各分店屢經撤退，不圖今日復睹此局。

1946年11月16日，國共談判破裂，周恩來離開南京前夕招待中外記者，慷慨陳詞，預言「我們不久就要回來」。從那時起，就有不少人每夜通過無線電台，尋找「北方的聲音」。開始還限於親共分子，後來範圍就愈來愈廣，許多國統區的老百姓都習慣於根據「北方」的消息來判斷時局。

1948年元旦一清早，就有人暗暗傳播着昨夜新華社廣播的、據說今天將在中共的《人民日報》（此時報社還設在晉察冀邊區所在地的武安）正式發表的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會議上的報告：〈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在言論相對自由的香港，在茶館酒肆以至電車上，人們都公開地談論着毛澤東先生的這篇文章，並不掩飾自己的或興奮或沮喪或惶惑的反應。五十年後，我們找到了這張顏色已變灰黃的報紙，探尋當年引起震撼的原因。震源大概就在毛澤東宣布了一個國民黨政府竭力想否認卻又掩飾不住的事實：經過17個月的較量，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經打退了得到美國支持的蔣介石數百萬軍隊的進攻，並使自己轉入了反攻。而毛澤東由此引出的判斷（毋寧說他指出的事實）卻足以石破天驚：「這是一個歷史的轉捩點。這是蔣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捩點。這是一百多年以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捩點。」

毛澤東的文章就這樣把一個無可懷疑的歷史巨變與轉折，由此引發的將是中國社會生活的一切方面，包括我們所要着重討論的文學藝術的巨變與轉折，推到中國每一個階級、黨派、集團，每一個家庭、個人的面前，逼迫他們作出自己的選擇，並為這選擇承擔當時是難以預計的後果。1948年也因此永遠深埋在經歷了那個時代的一切中國人（不論當時他們的年齡有多大）記憶的深處，並為後代人所注目：今天人們所關注

一、1949-1980 ——
沈從文在被強迫遺忘中堅守



沈從文(1902—1988)，1949年自縊不遂後，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並發展出三個方面的新思想：新愛國主義、新人民觀及新唯物論。圖為與妻子張兆和合攝。

1949年初，當經過1948年的大決戰，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敗局已定，世人或滿懷期待和喜悅，或充滿疑慮以至疑懼，準備面對新中國的誕生的時候，文壇上爆出一個自殺事件：3月28日，在三四十年代擁有廣泛影響的作家沈從文用剃刀劃破了頸部及兩腕的脈管，又喝了一些煤油，試圖結束自己的生命。這在當時即引起強烈的反響，以後就成為新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史的一個「謎」。它以極其尖銳的形式，提出了一個易代之際知識分子的選擇問題。由此而引發了人們對沈從文在1949年以後的命運的關注：他一身兼具「鄉下人」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雙重立場與身份，自然是別有一種典型意義的。本文將就此討論五個問題。

一、沈從文為何自殺？

文人自殺是易代之際的典型現象。1948年11月出版的沈從文的朋友朱光潛主編的《文學雜誌》曾發表文章，討論當年王國維的自殺，以及1948年詞人、鑄刻家喬大壯¹的自殺，指出：「今日已不是朝代的更易，而是兩個時代，兩種文化在那裏競爭。舊的必滅亡，新的必成長。孕育於舊文化裏的人，流連過去，懷疑未來，或對於新者固無所愛，而對於舊者已有所懷疑、憎恨，無法解決這種矛盾，這種死結，隱逸之途已絕，在今日已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無可奈何，只好毀滅自己，則死結不解而脫。像王靜安、喬大壯兩位先生都是生活嚴肅認真、行止甚謹的人，在這年頭兒，偏偏就是生活嚴肅認真的人，難以活下去。所以我們對於王、喬兩先生之死，既敬其志，復悲其遇，所謂生不逢辰之謂也」。

沈從文從他的「常」與「變」的歷史觀出發，早在 1948 年即已認定：「一切終得變。中國行將進入一個新時代，則無可懷疑」。在這個意義上，「變」即「常（態）」（「道」）。「凡事將近於自然。這裏若有個人的滅亡，也十分自然」²。

「舊的社會實在已不濟事了，得一切重作安排」。這就意味着要「一切價值重估」。問題是這樣的「易代」，由「舊時代」將轉入怎樣的「新時代」，將發生怎樣的價值變化？沈從文也有一個明確的判斷：「二十年三十年統統由一個『思』字出發，此後卻必須用『信』字起步」³。十三年後的 1961 年，沈從文又這樣談到自己這樣的知識分子：「他幸又不幸，是恰恰生在這個人類歷史變動最大的時代，而恰恰生在這個點上，是個需要信仰單純，行為一致的時代」⁴。以後的歷史發展證明了，沈從文的判斷，是有它的道理的：至少說「毛澤東時代」確實是一個「需要信仰單純，行為一致的時代」。

於是，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像沈從文這樣的知識分子能適應這個由「思」向「信」的歷史大變動嗎？

沈從文發現了自己的三大困境：

- （一） 作為一個「文法部門」的知識分子（即今天所謂人文知識分子），能夠放棄「思想」嗎？「我思，我在」⁵，「思」對沈從文具有存在論的意義，豈能輕言放棄？而且思想是「有根深蒂固連續性，頑固排他性」的，是無法「忘我，無我」的，「我持」愈強愈難做到⁶。

- (二) 作為一個「內向型」的知識分子，自己天生地「能由疑而深思，不能由信而勇往」，「永遠有『不承認現實』的因數」，有「永遠不承認強權的結子」，「總覺得現實並不合理」。這樣的懷疑主義的，永遠不滿足現狀的知識分子，能夠和需要用「單純信仰」來維持既定統治秩序的「時代要求」相適應嗎？⁷——人們很容易聯想起魯迅在《文藝與政治的歧途》裏對「不滿意於現狀」的「感覺靈敏」的「文藝家」的命運的思考。其實，幾乎和沈從文同時，後來成為「胡風分子」的張中曉也在思考這個問題⁸。
- (三) 作為一個固執的「鄉下人」，「鄉村簡單生活和自然景物」，以及反映這樣的生活理想的「舊小說」，是自己多年來抗拒現實黑暗，避免自我屈服、墮落的三大救手，安身立命之處，這樣的「生命經驗的連續性和不可分割性」是能夠輕易割斷的嗎⁹？這背後似乎還隱含着對「鄉土中國」的消亡的疑懼。

這已經涉及到新時代如何看待自己，自己視為生命，極為看重的文學上的成績的問題。本來，沈從文對於在「一切價值重估」的時代，自己「許多努力得來的成就」，「自不免都若毫無意義可言」是有思想準備的¹⁰，但卻沒有想到，他所面臨的卻是「大批判」的革命風暴：郭沫若《斥反動文藝》，北大學生「打倒新月派、現代評論派、第三條路線的沈從文」的大標語。而郭沫若的批判其實是大有來頭的。據《毛澤東年譜（1893-1949）》透露，1948年1月14日毛澤東曾為中共中央起草致香港分局、上海局及各中央分局電，內稱：「要在報刊上對

第一講

我的人生之路和治學之路（上）

2002年3月12日·3月21日

現在開始講我的人生之路和治學之路。60多歲講傳記材料似乎有點早，按照中國傳統應該到70、80歲。但是我又一想，萬一死掉怎麼辦？所以現在先來講一點，其實這些材料以前都在書裏寫過，今天不過是系統化一點，再補充一些細節。

我曾經說過，我的研究有兩個目的，一個是「還債」，一個是「圓夢」。

那麼，我有什麼「債」？簡單說起來，是三筆債：欠家庭的債，欠年輕人的債，欠自己的債。

一、我的家庭

先談家庭。我出身於世家。外祖父項蘭生，他一生經歷很豐富，從晚清到辛亥革命，到1959年去世。我昨晚還在看他的年譜，看得津津有味。外祖父出生於1873年，是晚清著名的維新派思想家王韜的學生。他的年譜裏有一段對王韜的回憶很有意思：「韜師住四馬路十路……韜師談論甚豪，論天下大勢，歷兩時許，滔滔不絕。」第二天他又請外祖父吃飯，「並贈著述十數種，以後往見數次，幾曾嘉許，頗得教益，並嘗通書後，對於八股文不必看的太重，務必多讀史書，認

識世界大勢，為立身行己基礎。功名問題，可以堅決放棄。」這裏記述了我外祖父受王韜那一代的影響，老師強調的是：八股不要看得太重，要多讀史書，認識世界大勢。這是一個非常開闊的眼光。後來我外祖父成為維新派人士，他最早在杭州辦白話報，開辦安定學堂；然後又擔任浙路公司公務科長。辦學堂，辦報紙，修公路，這都是開時代風氣之先的。以後他做了大清銀行的秘書官，他的日記記載了辛亥革命時大清銀行界對革命的反應，我看了覺得很有史料價值。以後他又創辦浙江興業銀行，擔任董事長，到 50 歲時就退休了，56 歲（1928 年）時完全退休。可以看出他是早期維新派人士，而且又較早參與中國銀行界，應該是江浙實業界的一個代表人物。

我的父親天鶴先生是安定學堂第五屆畢業生，外祖父就把長女嫁給自己的得意門生。我的母親從小受西式教育，請英語老師教英文。父親後來大概是 1906 或 1908 年去美國留學。他先是考取了清華學堂預科，然後從清華畢業後到美國康乃爾大學學農科。胡適也在那裏學農科，他應該是胡適同學。我曾談過 20 世紀初有兩次留學高潮：第一次是包括魯迅在內的留日學生，主要學習人文科學，學軍事，學政治；第二次高潮是我父親這一撥留美學生，主要學習自然科學。那時著名自然科學家竺可楨，語言學家趙元任等都是我父親的朋友。他們發起組織自然科學家團體，辦《科學》雜誌，我父親是最早發起人之一。我曾經研究過他們的《科學》雜誌。當時在中國比較早提倡民主科學，一個是《新青年》，另一個就是《科學》雜誌。我們過去對自然科學這一塊不夠重視，其實真要研究五四，自然科學家是不能忽略的，我父親基本主張農業治國，是農業方面的專家。後來「好政府主義」成為這批知識分子的共同追求，強調要改變中國面貌必須進入體制內，這與我們今天某些知識分子的思考非常接近。所以蔣介石 1928 年統一中國

後，國民黨也試圖走專家治國的道路，有一批專家進入國民黨政府機構內，我父親就是在這個背景下參加國民黨政府，在抗戰時擔任國民黨政府農業部的常務司長，相當於今天主持業務工作的副部長。我父親主持全國農業有十五年之久，在抗戰時期對大後方農業的發展起了很大作用。我研究了她的農業思想，覺得非常有意思。他提出一個觀點：發展農業最根本的目的是要提高農民經濟收入和生活水平，為達到這個目的要綜合發展，強調農業的商品性，發展商品農業，而且從金融，信貸，生產，流通，科技，教育——各個環節發展農業經濟，這些農業經濟思想與今天非常接近。但當時在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統治下不可能實現，實際上沒起多大作用。在我看來這也是個悲劇。總的說來，我父親屬於胡適這個體系。1948年胡適準備組閣，我父親是他組閣名單中的農林部長。我另外一個哥哥，三哥，抗戰時從淪陷區逃到重慶，後來跟穆旦他們一樣作為大學生當美軍翻譯，以後進入外交界，1949年從大陸到台灣，以後又到美國，作國民黨駐三藩市領事。他和父親都屬於國民黨系統。

我另外一個哥哥一個姐姐屬於共產黨系統。我們家庭有兩次大分離，一次是抗戰初期，父親隨國民黨遷重慶，就把幾個較大的哥姐留在上海外祖父和舅舅家，我生於重慶，當時哥姐還在上海淪陷區，我們沒見過面。我二姐抗戰時參加共產黨地下工作，從上海參加新四軍，成為一個文工團員。她的丈夫丁毅，就是《白毛女》的作者之一，是一個忠實的老共產黨員。我和二姐解放後才見面。還有一個在淪陷區的哥哥也參加地下黨，成了南京學生運動的一個領導人。在《1948：天地玄黃》有兩個地方提到我的哥哥姐姐，別人不知道，這裏告訴大家一個秘密。裏面有兩章比較特別，別的文學史家不會寫，這與我的家庭遭遇有關。其中一章寫學生運動中的文藝活動，可以說這一章是

為我的哥哥寫的。還有一章寫解放區的文工團活動，為的是紀念我姐姐，而且還引用了一段她的文字，是有關知識青年與戰士結合的感受，寫得非常生動。我用這種方式默默紀念我的哥哥姐姐，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大家後來不提這些老共產黨員，我覺得不大公平，所以我盡可能的寫到他們當年的貢獻。

我們家第二次大分離是1949年前後。1948年我父親把我們從南京帶到上海，當時準備從上海逃到廣州，再逃到台灣去。結果到上海後我母親不肯走，因為他們兄弟姐妹一家人都在上海，我外祖父的好朋友陳叔通和張元濟當時都是進步人士，跟共產黨有聯繫，所以我母親不肯走。於是就讓我父親到台灣看一看，一看就回不來了。所以這也帶有很大的偶然性，我曾經跟李歐梵先生開玩笑說（我們兩個同年），如果當年到了台灣，就是跟他在一起了，所以歷史是說不清楚的。這就是我們家第二次分離：我父親去了台灣，我當外交官的哥哥去了台灣，後來我大哥去美國留學。我們家後來再也沒團圓過，我曾用一句話來概括我們家的悲劇：生不團圓，死各一方：我父親葬於台灣，三哥葬於三藩市，母親葬於南京¹。

我講這一段歷史有什麼意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是研究現代文學，現代思想史，特別是研究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的，而我們家庭就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命運的一個高度縮影，中國知識分子的各種類型在我們家都有體現。我父親可以看作進入體制內的知識分子，而我留學美國的哥哥則可以看作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其實我父親也多少帶有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色彩，是代表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進入體制的類型，我的參加共產黨的哥哥姐姐和姐夫是典型的忠誠的共產黨員，而我們最小的三個則是新中國以後培養出的人才。我們解放後都受到